

華麗島看中國：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歷史、地理科的支那意象

陳慧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 摘要

本文透過公學校的歷史與地理教科書，探討日本統治時代小學的史·地教育如何呈現中國。由於當時的教科書多以「支那」指稱中國，文中也特別說明有關日本統治時代「支那」一詞的使用。

歷史教科書描述的中國主要是「文化的中國」，內容以清代之前的中、日交流為主，有關中華民國建國後的敘述較少；長期來看，教科書的內容變化較小，除部分刪減外，階段性的差異不大。地理教科書呈現的中國則為當時的「現代中國」；其內容有明顯的階段性的變化，初期的版本只有局部的中國，到1924年教科書改版後「中華民國」才以完整國家的形象出現，而在1940年代的地理教科書裡，中國則是大東亞共榮圈下的中國。

整體來說，在當時公學校的歷史與地理教科書裡，不管是在哪一個時期，「中國」都是教科書裡著墨最多的「外國」。就實際的內容來看，日本統治時代史·地教科書的敘述幾乎很少批評中國，教學現場老師們的教學方向，或許才是造成當時學生對中國抱持負面觀感的重要原因。

關鍵字：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公學校、歷史教科書、地理教科書、中國意象、支那

## 壹、前言

或許是因為臺灣社會在國家認同上看法歧異，使得足以影響年輕人價值觀的學校教育——特別是人文學科往往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例如1997年國民中學增設「認識臺灣」課程、2006年「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將臺灣史單獨成冊編寫，到2011年「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是否正式納入高中必選課程，均引發大眾廣泛的討論。

這些年經過各方的努力，即便認同問題仍是許多人的困擾，但至少在歷史學門裡臺灣史終於不再消失隱沒於其他大歷史之中。然而，隨著臺灣內部政治局勢轉變與中國日益強大，近年來如何看待對岸的中國，似乎成為新的爭議來源。光是如何稱呼對岸中國，大家的看法就相當不一致。當媒體有意或無意識地以「內地」指涉中國，是否暗示了某種思維？我們教科書應該怎麼呈現中國？這些問題的出現，多少反映人們在思索如何面對中國時，內心的茫然與焦慮。

百年來（1895 - 1945年；1949 - 2011年）臺灣與中國分別隸屬不同政權，歷來臺灣的執政者，均曾透過教育傳遞不同的中國形象，使臺灣民眾對中國認識與想像，有階段性的變化。那麼在日本統治時代，臺灣學童透過教科書所接觸到的中國究竟是何種面貌？1942年，吳濁流（1900 - 1976年）在《南京雜感》中有如下的敘述：

對於南京的關心，是中日戰爭開始以後的事。在這以前，因不曾有過交涉，所以連究竟是怎樣的所在，都不曾去想過。對中國——自己的祖國——也是一樣的。依日本教科書的教育：鄰國是個老大之國、鴉片之國、纏足之國，打起仗來一定會失敗的國家，內憂外患無常的國家。雖曾想去看個究竟，由於沒有機會，學生時代歪曲的觀念，無法拔除，一直懷抱在心中。<sup>1</sup>

1 吳濁流，《南京雜感》（臺北：遠行，1977年），頁51。

然而，當時的臺灣的教科書，是否真如吳濁流所說，將中國描寫成自以為是卻又老打敗仗的落後鄰國？當時的日本教師在課堂上批評中國的情況普遍嗎？

受日本教育的王世慶先生（1928 - 2011年）曾經給過以下回覆：「東洋史老師們很少有批評性字眼，而東洋史課程有關中國歷史的講述，只有概要式的、按課本所列朝代談其興衰，大多是史事的敘述，比如秦始皇如何滅六國，又如何衰亡等等……。」在被問到對中國有何想法？會不會有祖國思想等親近的感覺？王先生的答案是：「我們這一輩人，比較沒有祖國的概念。蔣渭水先生、黃旺成先生、林獻堂先生他們就有祖國的概念，大正年間已經成年的人比較會有這種看法；至於在中日戰爭期間成長的人，比較沒有祖國概念。」、「到我們少年時代，已經進入戰爭時期，所以沒有對中國有祖國思想。」<sup>2</sup>兩位不同世代的前輩，他們的課堂經驗略有出入，至於教科書裡實際的內容如何，則須比對當時的教材才能得知了。

有關日治時代公學校的教育，近10多年來相關研究不少，如針對個別科目來看，其中又以國語、修身及歷史教科書的研究最為豐富，<sup>3</sup>本文使用到的地理教科書過去則較少被利用與討論。選擇以「歷史」與「地理」教科書裡的中國為研究對象，除了因為「中國」在史·地科出現的頻率較其他科目高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歷史科與地理科，在諸多學科中最能提供學童想像具體世界的元素——歷史提供了縱向的時間想像，地理則提供橫向的空間想像。在大眾傳播媒體還不算發達的日本時代，出國的機會又不多的情況下，教科書裡書寫的中國，應該可以算是臺灣學童認識中國的重要管道之一。

以下先就日本統治時代對「中國」的稱呼稍作解釋，並說明公學校

2 有關王世慶先生訪談內容，請參見林蘭芳、周婉窈、鄭麗榕整理，「王世慶先生臺大上課講述紀錄（三）」，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http://ppt.cc/53iq>（2011年9月12日瀏覽）。

3 如：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臺灣史研究》4卷2期（1997年12月），頁7 - 55；〈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臺灣史研究》8卷2期（2001年12月），頁1 - 63；蔡錦堂，〈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及其影響〉，《師大臺灣史學報》第2期（2009年3月），頁3 - 32；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教育〉，《臺灣史研究》10卷1期（2003年6月），頁33 - 83等。

實施史地教育的梗概。而後再利用公學校歷史與地理教科書作為討論對象，探討當時的中國是以怎樣的形象呈現在學童面前？在不同階段又有哪些變化？

## 貳、日治時代的「支那」與「中國」

日治時代臺灣公學校所使用的史·地科的教科書，無論哪一個版本，均以「支那」一詞稱呼中國。由於「支那」一詞容易引起爭議，在此先略加說明。

1895年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在日本統治的50年當中，中國內部歷經多次政權轉移，而臺灣方面用來指稱中國的辭彙，也有階段性的變化。如翻閱日記、回憶錄等私文書，老一輩的臺灣人在談到中國時，較常見到的是以「唐山」或「祖國」來稱呼，而日本的官方文書或半官方的報紙，則有「清國」、「支那」、「中國」、「中華民國」等不同用法。如以日本時代發行時間最長與發行量最大的半官方報紙《臺灣日日新報》為例，上述詞彙在新聞標題中使用頻率的高低，依序分別為：支那、清國、中國、中華民國。<sup>4</sup>

在諸多指稱中國的用語當中，又以「支那」一詞使用率最高也最讓人敏感。用「支那」來稱中國是否帶有貶意？觀察日治時代使用此語的語境、中日雙方官方的態度，或可看出端倪。根據《廣辭苑》的解釋：「しな（支那，秦的轉音）外國人對中國的稱呼，最早出現於印度佛典，日本從江戶中期以來到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間使用之。戰後避免用『支那』表示，而多以『シナ』書寫之。」「支那」自18世紀中葉以來即被日本用來稱呼中國，最初只是表音的中性名詞並無輕視之意。

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支那」開始予人負面的觀感？一般的說法是自日本大正時代結束（1925年）以後，1927年七七事變後輕視意味

4 透過「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的搜尋結果如下：「支那」共出現23,930筆，而「清國」有5,072筆，「中國」2,904筆，「中華民國」則有212筆。（搜尋時間範圍1896年6月17日 - 1944年3月31日，含《臺灣日日新報》前身《臺灣新報》之相關內容。）

更為濃厚。日本時代活躍於臺灣文化界的蔡培火（1889 - 1983年），在1921年的〈中日親善の要諦〉一文，與1928年《日本本國民に與ふ》（給日本本國人書）書中便呼籲日本，不要繼續使用「支那」一詞。<sup>5</sup>

觀感的轉變很難用明確的時間界定，但若透過當時中日官方檔案，則可看出兩國的態度與因應方式。1930年5月19日，國民政府於南京召開第60次的總理紀念週，會中由文書局長楊熙績作政治報告，其中在外交部分提到：「日本對於國際上文書尚稱我為支那。我稱彼為大日本帝國，彼奈何稱我支那。……在滿清政府時代，日本稱之為大清國，今不稱我為大中華民國而稱支那，吾殆滿清政府之不若矣！假使吾人稱彼為倭奴，於國際上之文書稱之為大倭奴國，我知日本必不承認……倘日本再有如此無理之字樣，我務當予以退還并嚴詞詰責之，是在我外交部之盡忠職務，其不辱國而已。」<sup>6</sup>聲明日後對中華民國使用「支那」名稱之公文一概不予受理。

同年10月31日，日本閣議通過〈支那國號ノ呼稱ニ關スル件〉（〈有關支那國號稱呼之件〉）。表示自1913年日本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後，在條約中以支那國或支那共和國稱呼新政府，然而近來由於該國官民表示不滿，加上本國國民使用中華民國者倍增，因此認為是更改慣例的適當時機，決議未來對支那國的條約國書以及國內或與第三國間的公文書均改用中華民國稱之。<sup>7</sup>（註4）當時的日本在面對中國的抗議後釋放了善意，決議在官方文書中改用「中華民國」稱中國，然而對民間並無強制規定。在日本閣議通過議案的第二天，臺灣的《臺灣日日新報》便刊登此一新聞，但僅有簡單數語，即便如此在二次大戰結束前該報對中國的稱呼用語，使用「支那」的頻率仍偏高。<sup>8</sup>

一直要到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務省發布〈支那ノ呼稱ヲ避ケル

5 參見林莊生，〈「中國」與「支那」兩個名詞在日據時代的意義〉，《臺灣文學評論》2：3（臺北：2002年7月），頁48 - 49。

6 〈國府昨晨之紀念週〉，《中央日報（南京）》，1930年5月20日，第2張第4版。

7 〈支那國號ノ呼稱ニ關スル件〉，1930年10月31日閣議決定，日本國會圖書館議會官廳資料室：[http://www.ndl.go.jp/horei\\_jp/kakugi/txt/txt01474.htm](http://www.ndl.go.jp/horei_jp/kakugi/txt/txt01474.htm)（2010年9月9日瀏覽）。

8 透過「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搜尋1931年11月2日後相關詞彙的使用情形如下：「支那」7,937筆，「清國」14筆，「中國」1,984筆，「中華民國」則有98筆。



コトニ關スル件〉（有關避免使用支那稱呼之件），將原先針對各主要報章雜誌主編的呼籲，也轉達各機關主管。表示中華民國對於「支那」一詞極度厭惡，希望未來避免使用支那稱呼，列舉替代支那的名詞，如中國、中華民國、民國；日華、鎂華、中蘇、英華等，不過歷史地理或學術上的敘述則不在此限。<sup>9</sup>

總體來說1930年中國透過外交手段要求日本避免使用，而後日本在外交文書上從善如流，但國內全面性的改用則要到戰後。日本在二次大戰結束前較少用「中國」一詞稱呼東亞的中國，可能也與避免和日本國內本州島西部的「中國地方」<sup>10</sup>混淆有關，戰前臺灣公學校用的教科書以「支那」稱呼中國，也僅是反映當時慣用語的一例。為行文方便，本文在討論時除引文外，其餘則以目前一般常用的中國表示。

### 參、公學校史・地教育梗概

歷史科與地理科成為公學校正式教學科目的時間，相較於修身、國語、算術等科目晚了許多。1898年臺灣總督府公佈《臺灣公學校令》後，確立臺灣近代初等教育制度，但一直要到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公佈後，歷史科才以「日本歷史」的名稱，進入公學校的正式課程，<sup>11</sup>雖然在此之前，與日本歷史有關的教材已以歷史人物等方式已經散見於國語、修身等教科書當中。<sup>12</sup>而地理科出現的時間則較歷史科略早些，1918年發布的《公學校規則改正》已將地理科列入公學校的

9 〈支那ノ呼稱ヲ避ケルコトニ關スル件〉，《公文雜纂・昭和21年・第12卷・樞密院・宮內省・外務省》1946年6月13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http://ppt.cc/e@F>，（2010年9月9日瀏覽）。

10 中國地方，漢語亦稱為中國地區。是指日本本州島西部的山陽道、山陰道地區，包含鳥取縣、島根縣、岡山縣、廣島縣、山口縣等5個縣。日本戰敗後，為與東亞國家中國區別，有時也稱之為山陽山陰地區。參見維基百科「中國地方」條：<http://ppt.cc/!n53>（2011年9月12日瀏覽）。

11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志》（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年），頁223、356。

12 參見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州的「國史」教育〉，《臺灣史研究》10：1（臺北：2003年6月），頁44 - 46。

課程當中。<sup>13</sup>若與日本國內歷史與地理科被列入國定教課書的時間相比（明治36年，1903年），分別晚了將近有1、20年之多。

以名稱來看，日本統治時代，臺灣初等教育所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共有三套，即1923 - 1934年的《公學校用日本歷史》、1934 - 1944年的《公學校國史》以及1944 - 1945年的《初等國史》，前兩者由臺灣總督府編修，後者則由日本文部省發行。<sup>14</sup>不過，若根據其實際內容的變動，將之劃分為1923 - 1936年、1937 - 1943年、1944 - 1945年三期，更能突顯階段性的差異。<sup>15</sup>

地理教科書若依名稱來分則有四套，分別為1921 - 1927年的《公學校地理書 兒童用》、1927 - 1934年的《公學校地理書》、1934 - 1944年的《公學校地理書 第一種》，以及1944 - 45年的《初等科地理》，其中1944年使用《初等科地理》，使用的是文部省發行的版本。實際內容也有多次更動，其中又以1923年與1944年的變化最大。有關公學校、國民學校史·地科相關教科用圖書，請參見下表一：

13 臺灣教育會，前引《臺灣教育沿革志》，頁323。

14 蔡蕙光，〈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歷史教育——歷史教科書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18 - 19。

15 蔡蕙光，前引〈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歷史教育——歷史教科書之分析〉，頁20。



表一、公學校、國民學校史・地教科用圖書相關公告

改訂時間	歷史教科書名稱	地理教科書名稱	府報與告示編號
大正10年 4月1日 (1921)	(無)	《公學校地理書兒童用》 卷一、卷二；《公學校地 理書附圖》	府報第2353號／告示 第62號（大正10年4 月15日）
大正12年 (1923)	《公學校用日本歷史》 上、下卷	《公學校地理書兒童用》 卷一、卷二；《公學校地 理書附圖》	府報第2959號／告示 第111號（大正12年6 月5日）
昭和2年 4月1日 (1927)	《公學校用日本歷史》 上、下卷	《公學校地理書》卷一、 卷二；《公學校地理書附 圖》	府報第15號／告示第3 號 （昭和2年1月18日）
昭和9年 4月1日 (1934)	《公學校用日本歷史第一 種》上、下卷；《公 學校用日本歷史第二 種》上、下卷	《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 卷一、卷二；《公學校地 理書第二種》卷一、卷 二；《公學校地理書附 圖》	府報第2086號／告示 第65號（昭和9年4月 29日）
昭和13年 4月1日 (1938)	《公學校國史第一種》 卷一、卷二；《公學校 國史第二種》卷一、卷 二	《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 卷一、卷二；《公學校地 理書第二種》卷一、卷 二；《公學校地理書附 圖》	府報第3206號／告示 第47號（昭和13年2 月8日）
昭和16年 4月1日 (1941)	甲號表《小學國史尋常 科用》上、下卷； 乙號表《公學校國史第 一種》卷一、卷二； 丙號表《公學校國史第 二種》上、下卷	甲號表《尋常小學地理 書》卷一、二； 乙號表《公學校地理書第 一種》卷一、卷二； 丙號表《公學校地理書第 二種》卷一、卷二； 《公學校地理書附圖》。	府報第4063號／告示 267號（昭和16年4月 13日）
昭和19年 4月1日 (1944)	甲號表《初等科國史》 上、下； 乙號表《初等科國史》 上、下	甲號表《初等科地理》 上、下； 乙號表《初等科地理》 上、下； 《初等科地圖》上、下。	臺灣總督府官報第624 號／告示491號（昭和 19年4月24日）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報》相關年份資料；蔡蕙光，前引〈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歷史教育——歷史教科書之分析〉，頁18。

日本官方在臺灣公學校實施歷史與地理教育，最初是否有預設的目標何？在地理科方面，1919年發布的《公學校規則改正》指出，地理科的教授目的在使學生了解有關日本與臺灣（原文使用本邦與本島）的自然與人文相關知識，及日本國勢大要。先由臺灣本島的地勢、氣候、區劃、都會、產物、交通等開始著手，而後逐漸擴及日本，並授予臺灣

直接相關的南支那與南洋等地的相關大要。<sup>16</sup>而歷史科方面，1922年發布的《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則說明日本歷史一科目的在使學童了解國體之大要、涵養國民精神，包括日本建國體制、皇統無窮、歷代天皇盛業、忠良賢哲事蹟、文化由來，及對外關係等大要。<sup>17</sup>基本上，地理科是以使學生了解臺灣為中心，而後向外拓展至日本以及與臺灣關係密切的南支那（中國華南）、南洋等的相關地理知識；而歷史科則是使學生了解日本歷史，以及部分與日本相關連的外國史。

到了1930年代，隨著日本向外擴張、發動侵略戰爭，站在同化政策第一線的公學校，也加強向學童灌輸戰爭體制的意識型態，這些內容也反映在教科書當中。<sup>18</sup>1941年日本國內頒布《國民學校令》，臺灣隨後也改正了《臺灣教育令》將小學校與公學校一併改稱為國民學校，<sup>19</sup>在此背景下，過去的教學科目被統合成為國民科、理數科、體鍊科、藝能科及實業科，「歷史科」與「地理科」則被劃在國民科之下。在當時《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中明訂這兩個科目的教學目標分別為「使兒童了解我國歷史之大要，自覺皇國的歷史使命」、「讓兒童了解我國國土、國勢及諸外國之情勢大要，培養愛護國土的精神，使他們自覺皇國在東亞及世界的使命」。<sup>20</sup>史、地科的教學目的與其他的科別一樣，在這段期間增添了較濃厚的軍國主義色彩。

在各階段不同的教學目標下，臺灣公學校史·地科會怎麼書寫中國呢？在歷史科方面，本文將以1929年的《公學校用日本歷史》，1937 - 1938年的《公學校國史》以及1944年後使用的《初等科國史》為分析對象；地理科部分則以1921年的《公學校地理書兒童用》、1936年《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以及1944年後使用的《初等科地理》為主，觀察當時公學校歷史教科書裡的中國，是以何種樣貌呈現在學童眼前。

16 臺灣教育會，前引《臺灣教育沿革志》，頁336。

17 臺灣教育會，前引《臺灣教育沿革志》，頁365。

18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5年），頁110 - 111。

19 許佩賢，前引《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頁114。

20 許佩賢，前引《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頁115、118 - 119。

## 肆、歷史科裡的文化中國

日治時代臺灣公學校歷史教科書，內容是純正的「日本史」，然而對巨大的鄰國——中國，不太可能隻字不提，特別是日本與中國在政治、文化方面長時間的往來。本節將先羅列各版本歷史教科書裡出現「中國」（支那）的課名，觀察其篇目與比重，其次簡要說明其內容，觀察當時課文裡的中國書寫篇幅大概有多少、挑選的又是哪些主題？此外，隨著滿洲事變爆發，中國與日本的關係逐漸緊張，教科書的內容又是否受到影響？

### 一、篇目與比重

1929年出版的《公學校用日本歷史》分上、下卷，兩卷共45課。在此版本裡，中國分別出現在〈聖德太子〉、〈天智天皇與藤原鎌足（二）〉、〈弘法大師〉、〈北條時宗〉、〈足利義滿〉、〈豐臣秀吉（二）〉、〈德川家光〉、〈德川光 〉、〈明治天皇〉等9課。<sup>21</sup>

1937、1938年版的《公學校國史》則分一、二兩卷，共39課。而內容提及中國的課文包括：〈聖德太子〉、〈天智天皇與藤原鎌足〉、〈最澄與空海〉、〈北條時宗〉、〈豐臣秀吉〉、〈德川家光〉、〈德川光 〉、〈明治天皇〉〈今上天皇〉一共9課。<sup>22</sup>

1944年起臺灣學童改用日本文部省出版的《初等科國史》，此套教科書在形式與內容上，與前兩期有很大的不同，形式由原先「以人物為中心」轉變為「主題式」的編寫。受1930年代以來日本經歷諸多戰事影響，內容也較前兩期增添明顯的皇國史觀。<sup>23</sup>在臺灣採用日本內地使用的教科書，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戰況吃緊，總督府無暇編纂新的教科書，因此使用文部省編纂的現成書；另一方面，「國史科」的成立是

21 參見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上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29年；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下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29年。

22 參見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一，臺北：臺灣總督府，1937年；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年。

23 關於《初等科國史》進一步之研究，請參見蔡惠光，前引〈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歷史教育——歷史教科書之分析〉，頁103 - 120。

為了「自國史」的建構，在急激的同化政策（皇民化）政策下採用與日本國內相同的國史教科書，將臺灣納入自國史建構更進一步的發展。<sup>24</sup>

《初等科國史》分成上、下兩冊，共15課。課文內容提及中國者包括：〈奈良の都〉（奈良之都）、〈鎌倉武士〉、〈のびゆく日本〉（向外拓展的日本）、〈東亞のまもり〉（東亞的守護者）、〈世界のうごき〉（世界的變動）、〈昭和の大御代〉（昭和治世）等六課。表二是此三階段公學校歷史教科書中，曾經出現中國相關內容的篇目：

表二：公學校歷史教科書中提及「中國」之相關課題

公學校用日本歷史 (1929年版)		公學校國史 (1937、1938年版)		初等科國史 (1943年版)	
課次	課 名	課次	課 名	課次	課 名
6	聖德太子	6	聖德太子	3	奈良之都
8	天智天皇與藤原鎌足（二）	7	天智天皇與藤原鎌足	5	鎌倉武士
12	弘法大師	11	最澄與空海	12	のびゆく日本 （向外拓展的日本）
20	北條時宗	17	北條時宗		
26	足利義滿	26	豐臣秀吉	13	東亞のまもり （東亞的守護者）
31	豐臣秀吉（二）	28	德川家光		
34	德川家光	29	德川光	14	世界のうごき （世界的變動）
35	德川光	36	明治天皇		
43	明治天皇	38	今上天皇	15	昭和の大御代（昭和治世）

從課文內容安排來看，中國史是除日本歷史外，在歷史教科書裡能見度最高的「外國」，次數還遠多於描寫臺灣本身的歷史。接下來，則針對提及中國的相關敘事稍作整理，以觀察日本時代的公學校歷史教科書是用怎麼樣的角度來描寫中國？

## 二、涉及中國的議題

《公學校用日本歷史》與《公學校國史》兩套教科書，兩者雖然書名不同，編寫的課題也有些許差異，但主要課目基本上改變不多，多半是解讀與遣詞用字的更動。以下將先列出兩者均編寫的議題，再對稍作

<sup>24</sup> 許佩賢，前引《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頁128 - 129。

更動處加以說明，並觀察有哪些課文內容在改版後消失了。

### （一）與中國有關的歷史議題

《公學校用日本歷史》與《公學校國史》各有九篇課文提及中國，其中篇名一模一樣、重複的篇目有七篇，即：〈聖德太子〉、〈天智天皇與藤原鎌足〉、〈北條時宗〉、〈豐臣秀吉〉、〈德川家光〉、〈德川光 〉、〈明治天皇〉（參見上表二），至於〈弘法大師〉與〈最澄與空海〉兩課篇名雖異，但所提的史事實則相同。換句話說，共有八項有關中國歷史的議題，出現在這兩套教科書裡，以下簡述其內容中涉及中國的部份：

〈聖德太子〉一課，描述聖德太子（574 - 622）年間，日本與隋代中國的交流往來。其中提及當時的中國國勢強大、學術興盛，因此瞧不起外國並且將其他國家視為屬國。不過，聖德太子並不懼怕隋朝的國勢，仍以「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等語，遣使送往中國。而後，隋派遣使者到日本，日本送留學生往中國，此後中國的學術無須經由朝鮮，已可直接傳入日本。先後兩個版本最大的差異在於，年代較晚的《公學校國史》中增加了日本與隋代的關係為「對等往來」之敘述。<sup>25</sup>

〈天智天皇與藤原鎌足〉一課，則敘及唐代中國。其中描述，當時的中國稱「唐」，國力相當強盛，協助新羅滅了百濟與高麗，由於當時的日本致力於國內政治，故使日本與朝鮮的關係分離。相同的史事在《公學校國史》的版本中，另外增添了一段有關日本派兵協助百濟的敘述。<sup>26</sup>

1929年版的〈弘法大師〉與1937年版的〈最澄與空海〉兩課篇名雖然不同，但內容均是介紹最澄（767 - 822）與空海（774 - 835）兩人赴唐學習佛法的經過。只是前期的課文敘述偏重於空海的事蹟，到了後期則增補了一段多的文字介紹最澄，讓兩人在課文中的比例較均

25 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上卷，頁20 - 21；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一，頁27 - 28。

26 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上卷，頁28 - 29；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一，頁36。



衡。<sup>27</sup>

臺灣文獻

第六十二卷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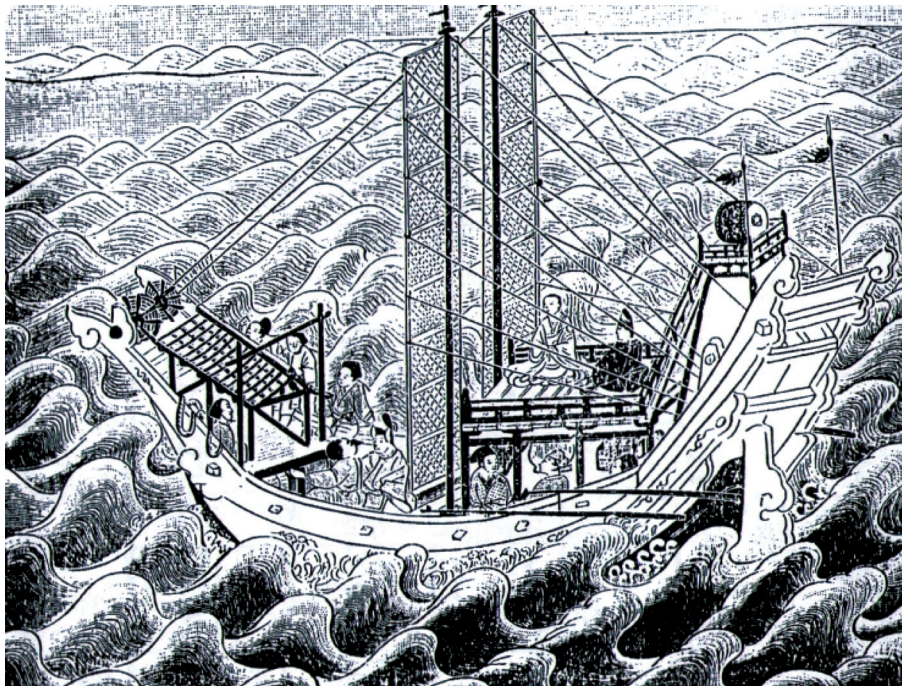


圖1「空海渡唐」（《公學校用國史（第一種）》卷1第11課〈最澄與空海〉插圖）

〈北條時宗〉一課裡，對中國的描述是關於蒙古大軍攻打日本的歷史。課文中提到，北條時宗（1251 - 1284年）時蒙古興起於中國北方，征服了高麗後，送給日本一份要求從屬的無禮國書，被時宗回絕。蒙古愈加興盛後，一度率軍攻打日本，但由於日軍防禦完備，元軍最後失敗逃逸，史稱「文永之役」。而後，蒙古再度遣使日本，時宗為展現日本的決心故將來使斬首，促使蒙古二度派軍攻打日本，所幸「神風」相助，才讓14萬蒙古大軍再次鎩羽而歸，史稱「弘安之役」，文中並提到，日本全國上下一心，是兩次打勝仗的關鍵。<sup>28</sup>

〈豐臣秀吉〉一課，提及與明代中國的戰爭。豐臣秀吉（1536 - 1598年）平定日本境內後，欲進一步拓展與外國的往來，為此希望朝鮮保持中立，並出使菲律賓與臺灣，然而明代並未對其要求作出回應，

27 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上卷，頁28 - 29；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一，頁36。

28 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上卷，頁71 - 75；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一，頁87 - 92。



於是秀吉攻下朝鮮，打敗前來協助的明軍。明朝政府得知後相當惶恐、故遣使求和，然而送來的國書以「日本國王」稱秀吉，秀吉相當不悅因而拒絕來使，並計劃再度出征，作後因為秀吉病死而未果。<sup>29</sup>

〈德川家光〉的課文裡，則在兩處提及中國，一是講述臺灣歷史時，提到在鄭氏三代滅亡後的兩百餘年，清帝國統治臺灣島。另外，則是說明在德川家光（1604 - 1651年）鎖國期間，僅開放荷蘭與中國兩國可在長崎與日本貿易。<sup>30</sup>〈德川光圀〉一課，則提到德川光圀（1628 - 1701年）在讀了中國歷史上伯夷、叔齊的故事後，深感兄弟倫常的重要，而決定由他兄長的兒子繼承其水戶藩主的位置。此外他也體會到歷史的重要性，故立志書寫國史，最後完成《大日本史》一書。<sup>31</sup>

〈明治天皇〉的課文篇幅較長，文中提及中國的地方共有三小段。第一，在「征臺之役」（牡丹社事件）小節當中，提到在牡丹社事件後，清國以臺灣原住民不在清廷統治範圍內，不願對琉球居民被殺一事負責，最後日軍攻破牡丹社，清廷才以談判方式，透過承認日本出兵的正當性、賠償罰金來解決糾紛。比較有意思的是，在《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中，稱琉球居民為「國人」，年代較晚的《公學校國史》則改稱「琉球人民」，然後以括弧方式加註琉球即為沖繩縣。另外，《公學校用日本歷史》原有的「當時臺灣為清國領地」一句被刪除了。<sup>32</sup>第二，在「明治27、8年戰役」（甲午戰爭）中，提到清國在朝鮮事變中扮演的角色，日清開戰的經過，最後以日清簽定「下關條約」作結。第三，「明治37、8年戰役」則提到「北清事變」（八國聯軍）的發生，起因於清國排外思想，故引發各國攻入北京，最後清廷以賠償鉅款與列國取得和平。

29 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下卷，頁13 - 17；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一，頁155 - 160。

30 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下卷，頁31 - 34；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二，頁16 - 19。

31 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下卷，頁36；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二，頁22。

32 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下卷，頁85 - 87；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二，頁81 - 83。

上述幾段歷史課題，如果轉換成當前臺灣學生熟習的歷史語彙，主要包括了：1、隋、唐時代東亞文化圈的形成、日本漢化運動的展開；2、唐與日本的白江口之役；3、元軍進攻日本；4、明與日本在朝鮮的戰爭；5、日本鎖國與中日貿易；6、牡丹社事件；7、甲午戰爭；8、義和團與八國聯軍。這些史事部分也出現在今天臺灣歷史教科書裡（近10年來有關征戰的部分有減少的趨勢），然而兩者除了使用的詞彙不同，視角也很不一樣。

## （二）被移除的中國

有些在《公學校用日本歷史》裡所描寫的中國，到了1937 - 1938年版《公學校國史》階段卻被刪除了。最明顯的例子是《公學校用日本歷史》的第26課的〈足利義滿〉，在《公學校國史》裡議題相同的課目便將其中整段刪除，而這段課文原本寫了什麼？

〈足利義滿〉一課內容主要描寫足利氏的內部鬥爭，以及足利義滿（1358 - 1408年）豪奢生活等情節。課文最後一段，敘述足利義滿與明代中國的往來，其中提到，義滿在明朝建國後，派遣使到中國開始兩國間的往來。當時明政府送來的國書稱義滿為「日本國王」，義滿不僅接受，甚至以「日本國王」此種不合宜的自稱回覆中國。<sup>33</sup>這些文字在後來出版的《公學校國史》裡議題相近的〈足利氏盛衰〉一課中被刪除。1938年出版的編纂趣意書，僅簡單地交代「為避免有誤解之虞，故將足利義滿外交部分刪除」。<sup>34</sup>

## （三）日本歷史脈絡裡的中國文化

如以時代來看，公學校的歷史教科書當中提及了隋、唐、元、明、清各階段的中國。在課文當中，提到的隋、唐時代的中國時，均描寫其國勢興盛，並提到日本遣隋史、遣唐史以及學問僧等，赴中國進行文化交流的歷史。提到元代中國時，也多次強調其軍威之盛。在〈德川光圀〉一課，更是提到德川光圀因受中國歷史上伯夷、叔齊故事的影響，

33 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上卷，頁101。

34 〈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一編纂趣意書〉，收錄於臺北第二師範附屬公學校啟明會，《公學校國史 教授細目》（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38年），頁4。

故以兄長的兒子繼承其水戶藩主的位置，並體會國史的重要，爾後完成《大日本史》一書。這些課文情節，顯示中國國力曾經盛極一時，也透露日本文化部份內涵受中國影響。

基本上就歷史課本內文來看，以正面敘述居多。但為什麼在許多回憶文字中，他們對於透過學校教育所了解的中國，似乎帶有負面印象？課堂上老師的講解方式應是關鍵。鍾理和（1915 - 1960年）在其類自傳的小說〈原鄉人〉裡，寫到當時日本老師如何介紹中國：

日本老師時常把「支那」的事情說給我們聽。他一說及支那時，總是津津有味，精神也格外好。兩年之間，我們的耳朵便已裝滿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各種名詞和故事。這些名詞都有它所代表的意義：支那代表衰老破敗；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負責等等。<sup>35</sup>

透過當時各地公學校所編寫的教授資料、教授細目，或可一窺當時教育現場老師們講述歷史的角度。

以〈聖德太子〉一課為例，1935年高雄第一公學校對此課的幾個重要名詞，有如下的詳解：「隋」——隋文帝結束中國南北朝戰亂，使南北統一，其子隋煬帝頗為豪奢，向四鄰擴張，瞧不起外國並視之為屬國；「見下げて」（輕視、藐視）——中國自稱本國為「中華」以示尊大，以隋代之盛更是無理的瞧不起其他國家；「國書」——煬帝見之相當不悅，在小野妹子靈活的交際手腕下終於取得諒解。<sup>36</sup>而1940年由新竹香山公學校所編的《公學校國史教科書取扱の研究》，更露骨地表示中國「尊大遠交近攻」的策略是其傳統的國家性格，支那事變（七七事變）的發端也是因此而來。<sup>37</sup>在這樣的解釋下，隋代君主奢侈、自以為

35 鍾理和，〈原鄉人〉，收於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輯，《鍾理和全集2》（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頁7。

36 高雄第一公學校代表者荻本滿重，《公學校國史教科書教授資料の研究》（高雄：高雄第一公學校，1935年），頁28。

37 〈教科書内容の具体化並に補説〉卷一，收於佐佐木四郎，《公學校國史教科書取扱の研究》（新竹：香山公學校國史研究部，1940年），頁17。

是的形象，更鮮明地呈現在學童面前。

其它對傳統中國的描述，在有關元代與明代中國的幾課裡，也均提及中國要求日本稱臣的經過。當時的教科書在陳述歷史上日本與中國的往來時，雖然呈現了中國文化的輝煌，但教授資料、教授細目，卻不時描寫過去中國傲慢的老大姿態，反映當時部分教師對中國的理解，如果學生接觸到的是這一類型的老師，也難怪會對中國產生「鄰國是個老大之國」<sup>38</sup>的觀感。

### 伍、史·地科呈現的現代中國

上述歷史教科書中所描述的中國，主要是清代以前日本與中國交流往來的歷史，令人好奇的是，對於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日本時代公學校的歷史教科書是怎樣向臺灣學童講述「這個國家」的歷史？此外，偏向介紹現實世界概況的公學校的地理教科書，又是怎麼描述學生所處當下的現代中國？

#### 一、大正時代以後的現代中國

以1938年的《公學校國史》為例，提及1912年以後近代中國的議題僅有「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與「上海事變」（一二八事變）。1938年出版的《公學校國史》，課文中已出現距離當時不過6、7年的「滿洲事變」與「上海事變」，但對1912年建國的「中華民國」卻隻字未提。若比對同時期日本小學生念的1935年版《尋常小學國史》或1940年版的《小學國史尋常科用》，有關「中華民國」的敘述其實也要到1940年後才出現。因此臺灣的公學校學童，要到1944年以後才有機會在歷史教科書裡正式見到「中華民國」的身影，也不是太奇怪。

對於上述「滿洲事變」與「上海事變」，臺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所編的《公學校國史細目》，提供授課教師的說明中，將「滿洲事

38 吳濁流，前引《南京雜感》，頁51。

變」的爆發，歸諸於東北軍閥的暴戾，因此對於因其錯誤的排日思想而陷入困頓的中國民眾，應寄予同情。<sup>39</sup>另外，「條約改正」一段，課文中雖未提及中國，但該書也把中國現狀拿來與日本比較，提到國力的充實是國際條約改正的第一要件，條約改正前日本與中國均是三等國家，透過與現代滿洲中國的比較，便可充分理解。<sup>40</sup>這樣的歷史敘事，一方面除了合理化日本出兵中國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凸顯現代中國的衰弱。除了具體史實的陳述外，中國在當時的教科書裡似乎成了新興日本的對照組，「衰老破敗」的中國形象，突顯了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進步與茁壯。

## 二、1920年代的局部中國

前述1919年的《公學校規則改正》提到，地理科的教授目標是使學生了解有關日本與臺灣的自然與人文相關知識，以及日本國勢大要。由臺灣本島出發，逐漸延伸至日本以及與臺灣直接相關的南支那、南洋等地。<sup>41</sup>以1921年3月28日發行的《公學校地理書兒童用》為例，卷一、卷二共15篇，內容以日本及臺灣等「本國」地理為主，「外國地理」部分僅有卷二關東州及南滿洲、南支那、南洋等三篇。（參見下表三）也就是說，當時公學校五、六年級的孩童，透過地理教科書所認識的世界，除了日本與臺灣之外，中國是他們所能接觸到關係最密切的「外國」。

39 臺北第二師範附屬公學校啟明會，《公學校國史教授細目》（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38年），頁189。

40 〈教科書內容の具体化並に補説〉卷二，收於佐佐木四郎，《公學校國史教科書取扱の研究》（新竹：香山公學校國史研究部，1940年），頁33。

41 臺灣教育會，前引《臺灣教育沿革志》，頁336。



表三、《公學校地理書兒童用》目錄

卷一	卷二
第一、大日本帝國……………1	第一、中部地方……………1
第二、臺灣地方（一）……………4	第二、關東奧羽地方……………8
第三、臺灣地方（二）……………7	第三、北海道及樺太地方……………18
第四、臺灣地方（三）……………15	第四、朝鮮地方……………24
第五、臺灣地方（四）……………23	第五、關東州及南滿洲……………31
第六、九州地方……………32	第六、帝國國勢……………35
第七、近畿・中國・四國地方…38	第七、南支那……………44
	第八、南洋……………50

其中關東州與南滿洲的部分共五頁，內容說明地理位置、南滿洲鐵道，以及大連、奉天、長春等重要都市。<sup>42</sup>南支那的部分則有六頁，內容介紹了福州、廈門、汕頭、香港、廣東等地，除各地的自然景觀外，也提到不少日本在當地的相關機構，如：日本總領事館、東瀛學校、博愛醫院、旭瀛書院，並說明臺灣籍民在廈門的概況。該課課文也指出南支那的福建與廣東兩省與臺灣關係很深，特別是漳州與泉州。<sup>43</sup>

整體來說，課文中所介紹的中國，是局部的北方中國與南方中國，且僅限於中國東北、福建、廣東等地，僅在介紹奉天時輕描淡寫地提到「支那首府北京也有鐵路通往此地」（「支那首府北京へも鐵道が通じてゐますし」）。<sup>44</sup>《公學校地理書附圖》中也只有關東州・南滿洲，與南支那的地圖，<sup>45</sup>「中華民國」與完整的現代中國圖像始終並未出現。

為何會有這樣的結果，可能的原因很多：首先，此階段公學校的地理教科書重視鄉土教材，內容是否與臺灣、日本相關連，是擇選的關鍵，關東州、南滿洲與南支那以外的中國，並非其關心的對象；其次，此一版本的地理教科書外國地理的篇幅相當少，僅在卷二的第7、第8課提及，有關中國境內的介紹已佔相當比例。更何況當時中國內部軍閥割據局勢紛亂，要敘述一個完整的現代中國恐怕也不容易。

42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兒童用》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21年），頁31-34。

43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兒童用》卷二，頁44-46。

44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兒童用》卷二，頁33。

45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附圖》，（臺北：臺灣總督府，1921年），第12圖、第14圖。



### 三、滿洲事變後的中國

為了因應學制的改變與國際情勢的改變，1921年後公學校地理教科書的內容有過幾次編修，1929年臺灣總督府針對改訂開始進行各項調查，在照會各地方廳及師範學校徵詢相關專家的意見後於1931年出版，<sup>46</sup>此版本在章節的安排與內容敘述方面，與10年前的版本已有很大的不同，如：新設一章敘述日本在南洋的委任統治地，更詳細地記述外國地理與日本相關之處，增加外國地理的篇幅，並將度量衡單位改用公制。<sup>47</sup>

在這10年當中，中國內部的局勢變化甚大。1926 - 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結束了北洋政府政權，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表示接受國民政府管轄後，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由南京的國民政府取代。1931年的「滿洲事變」，使日本與中國的衝突激化，1932年滿洲國成立。如此巨大的時代變動，是否也使公學校地理書裡的中國敘述產生變化？

先就形式上的篇幅來看，中國仍是諸「外國」地理中篇幅最多者。以1936年發行的第六版《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1931年第一版發行）為例，以全書來看，外國地理中，僅滿洲與支那單獨自成一單元，篇幅有5到10頁之多。<sup>48</sup>其他國家如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俄國等，多半僅有1 - 2面左右的篇幅，且均置於各洲底下以段落方式敘述。<sup>49</sup>（章節安排請見下表四）

46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卷一卷二改定趣意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31年），頁1。

47 臺灣總督府，前引《公學校地理書卷一卷二改定趣意書》，頁1 - 6。

48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36年），頁60 - 74。

49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卷二，頁91 - 100、頁106 - 112。

表四、《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目錄

卷一	卷二	
第一、大日本帝國…… 1	第一、奧羽地方…… 1	第九、歐洲…… 85
第二、臺灣地方…… 6	第二、北海道地方…… 12	第十、非洲…… 101
第三、九州地方…… 36	第三、樺太地方…… 23	第十一、北美洲…… 105
第四、中國地方…… 52	第四、朝鮮地方…… 29	第十二、南美洲…… 115
第五、四國地方…… 64	第五、關東州…… 38	第十三、大洋洲…… 121
第六、近畿地方…… 71	第六、我國南洋委任統治地…… 41	第十四、世界與日本…… 125
第七、中部地方…… 91	第七、大日本帝國總說…… 43	第十五、地球的表面…… 128
第八、關東地方…… 115	第八、亞洲…… 56	附錄
附錄	一、總論…… 56	
	二、滿洲…… 60	
	三、支那…… 65	
	四、東南亞…… 74	
	五、印度…… 79	
	六、西伯利亞…… 82	

在內容方面，1932年滿洲國的成立，在公學校的地理教科書中，滿洲是課程安排中學童第一個認識的外國，除了自然地理的介紹外，也提及新京是滿洲國的首府，日本與滿洲的關係密切、日人在該地者頗多，主要從事有關南滿洲鐵路等相關事業。<sup>50</sup>中國的部分，則在敘述南京時，表示該地為中華民國的首府，「中華民國」四字最晚在此時已出現在地理教科書當中。<sup>51</sup>此外與舊版本的地理教科書相同，1936年的《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也特別強調南支那過去即與臺灣的關係密切。<sup>52</sup>

此階段臺灣總督府而為原住民兒童編輯的《公學校地理書（第二種）》<sup>53</sup>，其篇目與《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大致相同，差別在於原住民兒童使用的版本，字體較大、用字也較簡單。比較特別的是，此版本刪去了南支那與臺灣過去關係一段，而以福州、廈門、汕頭等地與

50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卷二，頁65。

51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卷二，頁69。由於目前收集到的公學校地理教科書版本尚有缺漏，但根據伊原末吉，《公學校地理教材解說（第六學年）》（臺北：晁文堂，1927年），頁201 - 202的說明，1924年出版的《臺灣公學校地理書》卷二，應已提及「中華民國」。

52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卷二，頁70 - 71。

53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第二種）》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34第一版發行。

臺灣交通興盛代替。<sup>54</sup>或許是考量原住民學童與漢人小孩的生活經驗不同（漢人小孩的祖先多半是從「南支那」來的），因而有所差異。

#### 四、太平洋戰爭下的中國

1937年的「支那事變」（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開啟了中日不宣而戰的戰爭；1940年8月日本首相明白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稱，意在團結大東亞，將英美荷等西方勢力逐出亞洲；1941年12月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隨後美國與中國正式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就此展開。<sup>55</sup>

如前第小二節所述，隨著日本向外擴張、發動侵略戰爭，公學校教育也增添了不少戰爭體制的意識型態。<sup>56</sup>自1944年公學校改用文部省編纂的《初等科地理》，<sup>57</sup>當初此版本即是為了振興國民精神，因應大東亞政策所編寫的。<sup>58</sup>整體而言，此版本的地理教科書篇幅均較臺灣總督府所發行的多，內容也較深。在插圖方面，文部省版本的圖像增加更多完整的區域地圖、分布圖、城市區劃圖與攝影寫真，相較於過去臺灣總督府編寫的版本以版畫式的圖像居多，不但更貼近真實也更具體。

從圖像的呈現上，更明顯感受到戰爭氛圍與日本國家形象的置入性行銷，例如：頁27「美納島的降落傘部隊」，畫面上布滿了從天而降的空降部隊；頁53的「萬里長城」，長城上方繪有著日本軍裝的軍人；頁71的「上海江岸」，圖片右方露臺上的偌大的日本軍旗，彷彿才是整張照片的主角；頁80「香港空入城」，天空上方5架日本軍機一字排開，均是帶有強烈的戰爭色彩的圖像。而滿洲部分頁44與46的兩張今昔對照圖「鐵道網發達」與「新京十年」，更使滿洲數10年間的經營成果不言而喻。<sup>59</sup>

54 「福州・廈門・汕頭は臺灣との交通が盛です」見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第二種）》卷二，頁73。

55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臺北：三民，2005年），頁158 - 236。

56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頁110 - 111。

57 文部省，《初等科地理》下。東京：文部省，1943年。

58 參見海後宗臣，《圖說教科書の歴史》（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6年），頁170。

59 參見文部省，《初等科地理》下。



圖2 美納島的降落傘部隊  
(《初等科國史》下，第三課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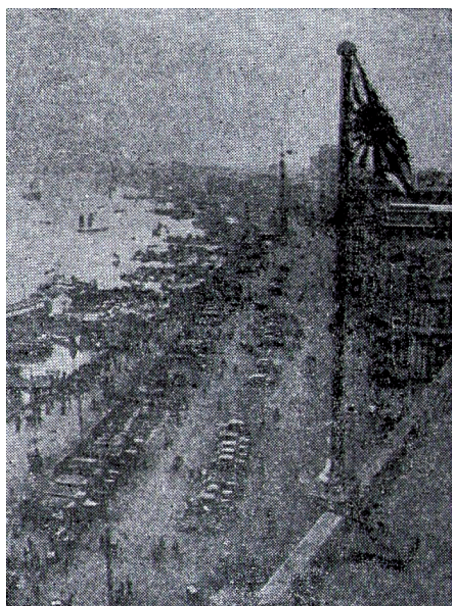


圖3 上海江岸  
(《初等科國史》下，第七課〈支  
那〉插圖)

1944 年開始使用的《初等科地理》，對滿洲與中國的敘事比 1920 - 1930 年代的版本更為詳盡。滿洲部分開宗明義即提到：滿洲與日本間親子般的關係，<sup>60</sup>其中有關滿洲地方的沿革，則提及日露戰爭對日滿關係之影響，也提到支那因抗日思想侵侮日本，促成昭和6年（1931）的滿洲事變，滿洲國於是誕生——與過去臺灣總督府版本相比，多了中國在其間的影響。此外也提到滿洲國的皇帝為清朝的末代皇帝、日滿一心，及日人必須引導滿洲成長等敘述。<sup>61</sup>蒙疆的部分，則因 1939 年 9 月「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從過去「支那」部分抽離獨立自成一課。<sup>62</sup>

有關中國的部分，則增加了不少對戰事的描述。與同屬國民科的國語讀本一樣，此版本的地理教科書收錄了許多中日戰爭乃至太平洋戰

60 文部省，《初等科地理》下，頁37。

61 「その後支那はあやまつた抗日思想にとらはれて、日本をあなどるやうになつたので、昭和六年九月、滿洲事變が起り、その結果滿洲國が誕生しました。」見文部省，《初等科地理》下，頁51 - 52。

62 文部省，《初等科地理》下，頁53 - 56。



爭的教材。<sup>63</sup>例如：介紹徐州時也提出是中日戰爭期間大會戰之地，說明上海郊外由於是上海事變與支那事變激戰之地，隨處可見戰爭的遺跡，以及日本皇軍佔領南京、南昌、漢口、漢陽、武昌等武漢三鎮的情形。<sup>64</sup>

值得一提的是，該課課文之末對於日本與中國以及中國住民的部分，著墨甚多。首先敘述日本與支那間自古以來關係深遠外，人種相近、文字相通，兩國在物資與商品方面也相互交流。再來則提到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中國受外國侵擾，日本應維持東亞和平、使中國人民早日脫離悲慘的生活，並指出當時有部分中國人協助美英對抗日本，應早日讓這些人醒悟，以完成大東亞之建設。最後則補充說明日本指導占領地域的情形，如：交通發達、物資豐盛等，以及1940年成立的南京新政府（按：即汪精衛政權），帶來光明的力量，該課72頁的插圖還特地挑選牌樓上掛有「慶祝新中央政府成立」布條的照片。<sup>65</sup>

有關中國住民部分，內容敘述中國幅員廣闊，各地人群的性質不同，以漢民族居多。由於中心領導人物與政府改變頻頻更異，導致人民自保的想法增強。支那是文字之國，善於宣傳與外交，重形式與禮儀，將自己的國家視為「中國」而以中華稱之，至今仍以中華民國為國號。為了與中國人攜手前進，對於其國民性、風俗、習慣等應有深切的了解。<sup>66</sup>



圖4 南京（《初等科國史》下，第七課〈支那〉插圖）

63 有關戰爭時期國語讀本的教材分析，請參見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5年），頁121 - 130。

64 文部省，《初等科地理》下，頁67、頁71 - 73。

65 文部省，《初等科地理》下，頁67、頁71 - 73。

66 文部省，《初等科地理》下，頁83 -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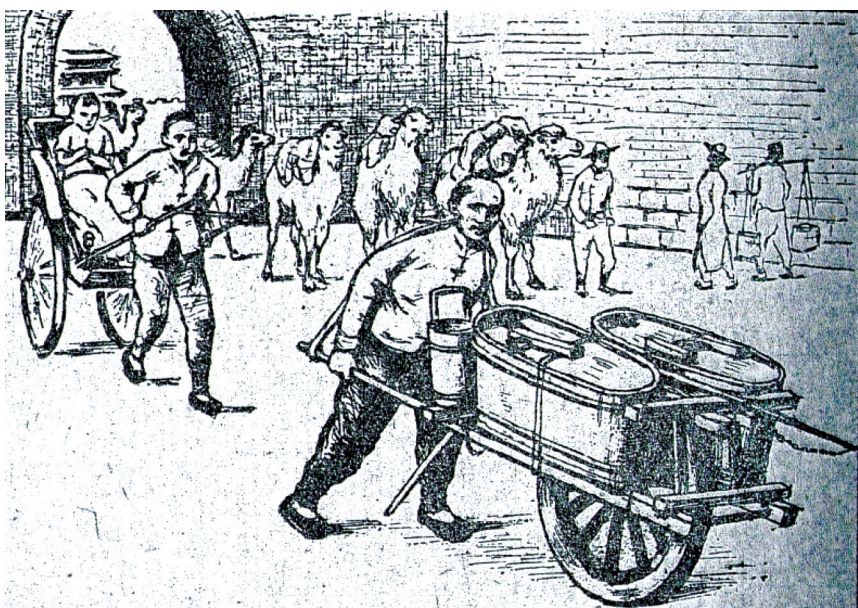


圖5 《初等科國史》下，第七課〈支那〉插圖

雖然在此版本教科書使用的階段，中日戰事已延續數年，1941年雙方也正式宣戰，但從課文敘述中，幾乎很少看到對中國負面的批評，部分內容反倒試圖讓學生去理解對中國人的處境，當然也不乏合理化日本在中國的戰事。這或許是因為在日本大東亞共榮的政策下，中日滿三國應要相互提攜，而英美才是共同的仇敵，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童認識的中國是敵人，也是朋友。

### 陸、結語

近代學校教育的教科書，因為肩負國家使命，很難不帶任何政治立場，日本時代的臺灣的歷史教科書，為了強化臺灣與日本之間的聯結，故以日本歷史取代將歷史中臺灣原有的中國經驗。不過，課本裡並沒有掩飾臺灣曾經隸屬清國的歷史，對中國的介紹有時甚至比日本小學



生用的教材還詳細，<sup>67</sup>只是隨著中日關係的變化，類似的敘述逐漸被淡化。<sup>68</sup>

在公學校歷史教科書裡，「中國」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是另以「外國」的姿態出現在學童面前，就其篇幅來看，中國史的內容遠比臺灣史來得多。但學生所能接觸到的中國歷史，主要集中在清代以前的史事，課本裡對1911 - 1945年間中國政局的變化則描述甚少，一直要到1943年使用的《初等科國史》才出現「中華民國」。臺灣學童透過歷史教科書裡對中國的敘述，可以知道她曾是個泱泱大國，了解其對日本典章制度與學術文化的影響，也看到了她的傲慢與衰敗。

至於公學校的地理教科書，呈現的則是當時的「現代中國」。從相關的編纂趣意書的說明可以發現，為順應時勢的變化，地理教科書編修的次數相當頻繁，並適時根據總督府的最新調查數據修改內容，可說相當「跟得上時代」。<sup>69</sup>最初公學校使用的地理教科書，外國地理的篇幅較少，僅介紹關東州及南滿洲、南支那、南洋，中國雖是當時學童透過地理課本第一個認識的外國，不過僅為局部中國。1924年改版後，外國地理的部分增加，中國改以完整的國家形象出現在課本；此階段原住民與漢人兒童透過教科書所認識的中國則略有差異。

戰爭期的地理教科書，和其他教科書的情況類似，無論是內容或插圖，戰爭的氣氛相當濃厚，有關中國戰場的相關內容不少，基於當時日本大東亞共榮的政策，除了合理化日本在中國境內的戰事外，書中也用不小的篇幅在探討中國人的國民性，試圖讓學生去理解對中國人的處

67 臺灣學童用的《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主要是依據當時日本學童用的《尋常小學國史》而來，由於語言能力的差異，為了避免臺灣學生負擔，刪減了許多章節與名詞。不過，也增補了些許《尋常小學國史》裡所沒有的部份，裡頭雖然主要是與臺灣相關的人名與地名，但也出現與中國相關者，如「隋」在當時《尋常小學國史》裡以「彼の國」代之，在《公學校用日本歷史》則標明為「隋」。（參見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日本歷史編纂趣意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23年），頁11；文部省，《尋常小學國史》上卷（日本：文部省，1920年），頁629。收於海後宗臣編，《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第19卷，東京：講談社，1975年。）

68 如《公學校國史》在描述「征臺之役」時，便將原有的「當時臺灣為清國領地」（其の頃臺灣は清國の領地であつた）一句刪除。參見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年），頁81 - 83。

69 參見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編纂趣意書並插繪の解説》。臺北：臺灣總督府，1922年。

境。當時教科書的書寫裡，並未出現以往對日本教科書的刻板印象——描述「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之類的情節。不過課本裡沒有寫，並不表示授課老師就不那麼會說，部分時人編纂、民間出版的教授細目（類似今教師手冊），的確可以看到不少對中國的反面評價。<sup>70</sup>

當時臺灣的學童透過教科書裡的輕描淡寫以及生活經驗，大概不至於不知道臺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的關連。而他們透過教科書所看到的中國，卻是由日本本島視角觀看的中國（特別是歷史科）、日本官方希望臺灣兒童認識的中國。當他們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關係曖昧的鄰國，究竟有何感觸？鍾理和曾寫下他對兒時地理課的回憶：

到公學校（如今的國民小學）五、六年級，開始上地理課……在地圖上，中國和臺灣一衣帶水，它隔著條海峽向臺灣劃著一條半月形弧線，自西南角一直劃到東北角。我沒有想到它竟是如此之大！……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沒完的，每說完一個故事，老師便問我們覺得怎樣。是的，覺得怎樣呢？這是連我們自己也無法弄明白的。老師的故事，不但說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重新凝視那優美的弧線。

除開它的廣大之外。它不會對我說出什麼來。<sup>71</sup>

當年困擾鍾理和的問題，或許也是現今部分學生心中的疑惑。現代臺灣的教科書該怎麼書寫中國，才不會使學生誤解傳統中國、不解當代中國？或許仍待細細思索。

70 如伊原末吉編寫的《公學校地理教材解說第六學年》在描述南京與上海時，便幾次提及中國的街道不潔的現象。見伊原末吉，《公學校地理教材解說第六學年》（臺北：晁文堂，1927年），頁208 - 210。

71 鍾理和，前引〈原鄉人〉，收於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輯，《鍾理和全集2》，頁7 - 8。

## 徵引書目

### 一、教科書、編纂趣意書

文部省，《小學國史尋常科用》下卷，日本：文部省，1941年。收於海後宗臣編，《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第20卷，東京：講談社，1977年。

文部省，《初等科地理》下。日本：文部省，1943年。

文部省，《初等科國史》下卷，日本：文部省，1943年。收於海後宗臣編，《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第20卷，東京：講談社，1977年。

文部省，《尋常小學國史》下卷，日本：文部省，1920年。收於海後宗臣編，《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第19卷，東京：講談社，1975年。

文部省，《尋常小學國史》下卷，日本：文部省，1935年。收於海後宗臣編，《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第20卷，東京：講談社，1977年。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上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29年。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日本歷史》下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29年。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日本歷史編纂趣意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23年。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兒童用》卷一。臺北：臺灣總督府，1921年。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兒童用》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21年。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第一種）》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31年第一版；1936年第六版。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第二種）》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34年第一版。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卷一卷二改定趣意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31年。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地理書編纂趣意書竝插繪の解説》。臺北：臺灣總督府，1922年。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高等科地理書》卷一。臺北：臺灣總督府，1935年第一版；1936年第二版。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一。臺北：臺灣總督府，1937年。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國史（第一種）》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年。

## 二、時人著作

荻本滿重，《公學校國史教科書教授資料の研究》。高雄：高雄第一公學校，1935年。

佐佐木四郎，《公學校國史教科書取扱の研究》。新竹：香山公學校國史研究部，1940年。

臺北第二師範附屬公學校啟明會，《公學校國史教授細目》。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38年。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志》。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 三、報紙・政府公報與官方檔案

《臺灣總督府府報》1897 - 1944年

《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月 - 1944年3月

〈國府昨晨之紀念週〉，《中央日報（南京）》，1930年5月20日，第2張第4版。

〈支那國號ノ呼稱ニ關スル件〉，1930年10月31日閣議決定，日本國會圖書館議會官廳資料室。[http://www.ndl.go.jp/horei\\_jp/kakugi/txt/txt01474.htm](http://www.ndl.go.jp/horei_jp/kakugi/txt/txt01474.htm)（2010年9月9日瀏覽）

〈支那ノ呼稱ヲ避ケルコトニ關スル件〉，《公文雜纂・昭和21年・第12卷・樞密院・宮內省・外務省》1946年6月13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http://jpimg.digital.archives.go.jp/pdf/S57B0408360000/076505322175.pdf>（2010年9月9日瀏覽）

#### 四、專書

王錦雀，《日治時期：臺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臺北市：臺灣古籍，2005年。

吳文星等編著，《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目次·索引》。臺北：南天，2003年。

吳濁流，《南京雜感》。臺北：遠行，1977年。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臺北：三民，2005年。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2002年。

唐澤富太郎，《教科書の歴史：教科書と日本人の形成》。東京：創文社，1968年。

海後宗臣，《圖說教科書の歴史》。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6年。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5年。

葉榮鍾，《小屋大車集》。臺中：中央書局，1967年。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輯，《鍾理和全集2》。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

#### 五、論文

##### （一）期刊論文

林莊生，〈「中國」與「支那」兩個名詞在日據時代的意義〉，《臺灣文學評論》2：3（臺北：2002年7月），頁48 - 49。

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教育〉，《臺灣史研究》10：1（臺北：2003年6月），頁33 - 84。

##### （二）學位論文

蔡蕙光，〈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歷史教育——歷史教科書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六、網路資料

「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izLEAu0T>

# The Image of China in Taiwan's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under Japanese Rule

Huei-Hsien Che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reconstruct how China was represented in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nten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used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during that period. Since the textbook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rule used “Shina” to designate China, this article also presents how and why the word was used.

The image of China was portrayed as “Cultural China” in the history textbook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efore Qing Dynasty were emphasized, whereas the narr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was marginal. In the long term, the content of history textbooks had not changed a lot. On the contrary, changes in geography textbooks were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image of China was portrayed as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earlier version, China was introduced partly. Not until 1924 di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ppear as a whole country in the textbooks. And in the textbooks of 1940s, China was included in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Generally speaking, either in history or in geography textbooks, China was described at greatest length among all foreign countries. In fact, the textbooks analyzed seldom criticize China. Accordingly, it might be the teachers' orientation that affected children's negative perception about China during that time.

Keywords : Japanese colonial rule, elementary schools in colonial Taiwan, history textbooks, geography textbooks, the image of China, Shina